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八十三期
2015年11月　　頁37~6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5.83.02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顯微
——重讀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

謝　世　宗**

摘　要

不同於新批評、喜劇與後殖民理論的研究視角，本文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為詮釋框架，將《玫瑰玫瑰我愛你》中美國大兵與臺灣妓女的關係，放置於跨國性旅行與地方色情產業升級的脈絡下來理解。 本文首先釐清（新）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之間的差異，並認為小說中董斯文以企業經營的手法，將妓女訓練成吧女，以新觀念活化舊產業，表現了資本主義以錢滾錢的精神。同時，董斯文並非好吃好色，反而有著禁慾主義的精神；肉體慾望的滿足不是他所追求的，發展企業規模才是他最終的關懷。《玫瑰》有如一部社會主義的寫實小說，描繪了資本主義理性計算的精神，傳統產業的現代化過程，以及生產關係中的剝削問題，其喜劇形式又使讀者在一笑之後反思你與我其實都是現實中那可笑的丑角。本文最後經由閱讀小說中的妓女，探討後殖民論述的盲點與侷限，並認為二元對立的殖民與被殖民架構常常抹消主體的差異性，並簡化階級、性別、性傾向所構成的多重關係。

關鍵詞：王禎和　後殖民主義　妓女　性旅行　資本主義全球化

103.11.11 收稿，104.06.16 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的仔細閱讀，讓筆者得以進一步修正、補充、說明。另外，本文最初的一些想法，來自柯慶明教授在一場會議中的發言，也趁此機會對柯老師多年來的指導一併表達感謝。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導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詮釋框架

針對王禎和的重要作品歷來已經累積不少的研究成果。最早的新批評的閱讀方法著重王禎和作品的藝術本質、思想主題與文學成就，其中高全之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1997）基於文本的精讀，或鳥瞰式地整體觀察，或就單篇小說抽絲剝繭，或選擇特定議題綜合討論，在新批評的研究典範中可以算是集大成之作。[1]邱貴芬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切入，開啟了王禎和研究的另一次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她討論了王禎和在《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中混用國語、臺語、日語與英文的現象，並視之為小說「抵中心」或「去殖民」的表現。邱貴芬當然不是第一位注意到王禎和作品中語言的混雜性的學者，然而前人的研究，多把這個現象看作一種喜劇的手法，[2]或順著王禎和本人的解釋，是對活潑的日常語言的忠實記錄。[3]邱貴芬結合巴赫汀（Mikhail Bakhtin）與後殖民理論，認為這部小說是以「『鬧熱滾滾』的大眾喧嘩笑聲抵制、瓦解官方設定的論述階級」。[4]於是，語言混雜的現象不只代表臺灣幾百年來，多重殖民狀況下，所產生的「跨文化特質」，還間接批評了國民黨政府遷臺以後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並表現了對美國強勢文化的抵中心姿態。[5]延續邱貴芬的切入點，李育霖進一步以德勒茲與瓜達里「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概念與翻譯理論為框架，認為王禎和的作品在模仿西方之外，「指出了一條正面的逃逸路線，使得翻譯主體得以尋找一個另類的符號體制」。[6]就王禎和對民間語言，尤其是臺語的興趣而言，他極可能對國民黨政府一言堂式的語言政策有所不滿；而臺灣人對美國文化的盲目崇拜與模仿，更是王禎和在〈小林來臺北〉與《美人圖》等小說中極力嘲諷的社會亂象。[7]

1 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臺北：三民書局，1997）。

2 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臺北：時報出版社，1986），頁 164。

3 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收入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頁 257-258。

4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66。

5 同上註，頁 167-168。

6 李育霖，〈翻譯與地方文學生產：以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4 期（2006 年 9 月），頁 34。

7 李文卿，〈走過殖民：論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之戲謔書寫〉，《文學臺灣》第 63 期（2007 年 7 月），頁 191-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對《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討論，多著重在語言的混雜性，不論是強調喜劇成分或去殖民意圖都各有道理，然而對小說角色與故事情節本身的解讀則著墨較少。小說的主要情節集中在一宗跨國性交易的準備過程：英文教師董斯文聯合錢議員與地方四大妓院的老闆，開設了以花蓮當地妓女為對象的吧女訓練班，準備在三百名美國大兵從越南來臺度假時，以性交易的方式大賺美金。典型的詮釋方式是將嫖客視為殖民者、妓女為被殖民者，如劉至瑜將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四部作品，放置在臺灣不同的殖民脈絡（包含日本、美國與國民黨）來考察，但均以妓女作為被殖民者的隱喻。[8]由劉至瑜的論文可知，這樣的象徵手法可追溯至日據時期的作品，而像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這類具有反帝、反殖民精神的作品中，日本嫖客到臺灣嫖妓如同日本對臺經濟殖民的說法，更是直接出現在小說文本當中。然而，妓女是否在上述小說中都作為殖民地臺灣的象徵，則必須進一步考察。

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關係是否相當於外國嫖客與本地妓女的關係？在某些情況下，二者有相當的關聯性，如二次大戰期間臺籍的慰安婦，被迫為日軍提供性服務，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外國嫖客與本地妓女的關係不必然就是殖民關係的翻版，而可能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供需原則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生產者（妓女）擁有賺錢的工具（身體），而消費者（嫖客）則擁有消費的能力（金錢）。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觀光客或美國大兵來臺買春與臺灣買春團到泰國、大陸、甚至日本進行「消費」，攸關的是消費水準的高低與購買力的有無，性交易本身和所謂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並無直接的關聯。在供需原則與消費邏輯的全球化現象中，跨國性交易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漸漸與一個城市的觀光產業相結合，像歐洲的進出門戶阿姆斯特丹或蘇聯解體後的布拉格等城市，即以性服務作為當地觀光旅遊經濟體系的一環，以吸引國際旅客，並為國家帶來可觀的外匯收入。[9]

以上的論點並不是要否認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對當今全球化下跨國性政治的影響力，也不否認過去的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的確造成了當今後殖民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劣勢。然而，就小說論小說，王禎和的《玫瑰》所要處理的

8 劉至瑜，〈臺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臺灣人文》第 4 期（2000 年 6 月），頁 1-20。

9 Simon Carter, “Sex in the Tourist Cit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ex as Part of the Provision of Tourist Services,” in *Tourism and Sex: Culture, Commerce and Coercion*, ed. Stephen Cliff and Simon Carter (London: Pinter, 2000), 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焦點比較不是臺灣淪為次殖民地或美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所要表達的主題也不僅僅是龍應台所指出的臺灣人的「媚美的心態」而已，[10]反而是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去思索「工商社會帶來的『唯利是圖』、『大利滅親』」的心態與行為。[11]建立在此一基本認識上，本文藉由盧卡奇（Georg Lukacs）的「典型」（types）與「總體性」（totality）的說法，[12]認為《玫瑰》一書透過地方色情產業的發展，所要處理的是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在臺灣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與運作機制。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首先釐清不同的（後）殖民狀態，並且定義本文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詮釋框架。以此框架，本文認為小說中董斯文以企業經營的手法，將妓女訓練成吧女，以新觀念活化舊產業，表現了資本主義理性計算的精神。更進一步，《玫瑰》一方面深刻地描繪了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總體性」，亦即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因而有如一部「社會主義寫實小說」（socialist realism novel）；另一方面，透過喜劇的形式，俾使讀者在一笑之後反思現實，承認你與我都是現實中那可笑的丑角。

二、界定（後）殖民情境

殖民主義與經濟控制本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而延伸出「殖民經濟」或「經濟殖民」等有待進一步釐清的辭彙。事實上「殖民情境」或「後殖民情境」常常因殖民地的歷史脈絡、地理位置、國際關係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就經濟的層面而言，我們可以大略區分為三種型態：古典殖民主義經濟關係、新殖民主義經濟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現象。含糊地使用「殖民經濟」一詞往往抹殺（後）殖民情境之間的差異性，反而無法釐清問題的本質。

10 龍應台正確點出小說的子題之一是「諷刺中國人上上下下媚美的心態」，如董斯文在小說頁 26 所說：「你們相不相信，為了接待美軍，從市長議長到縣長，個個忙得咧——連出汗的時間都莫有」。但龍應台卻誤認為這個子題在開頭第一章點出後，其後各章只是同一主題的重複，因此斷定《玫瑰》是一部扁平、靜態的失敗之作。見龍應台，《龍應台評小說》（臺北：爾雅出版社，1985），頁 78-79。龍應台的錯誤是以為《玫瑰》「只是」諷刺臺灣人崇洋媚外而別無其他，本文寫作的意圖正是要挖掘在「崇洋媚外」之外的其他重要子題。

11 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收入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259。

12 Georg Lukacs, “Marxist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ed. Michael J. Hoffman and Patrick D. Murphy, 2nd e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6-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古典殖民主義是以武力占領殖民地，以政治力統御被殖民者，以掠奪殖民地的天然資源與勞動力供殖民者使用。殖民者對殖民地的經濟剝削關係主要是依賴暴力脅迫的方式來維繫，如日本統治臺灣時，砍伐臺灣的林木或利用臺灣的勞動力與土地生產蔗糖，滿足日本本土市場的需求，即是古典殖民經濟的範例。然而，當殖民地成為新興國家後，是否就脫離了前殖民者的統治與壓迫，進入後殖民的獨立狀態？答案不必然是肯定的，如許多非洲國家，雖說政治獨立，但國家財政卻操縱在前殖民者手中；這種狀況，學者或稱之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前殖民者雖然不再以土地占領的方式控制殖民地，但卻可以透過經濟控制干涉這些新獨立國家的政治與軍事。[13]

最後一種後殖民情境，或可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現象。殖民者在古典殖民主義統治時期，在殖民地引進了現代化的資本主義與其意識形態，亦即從有限的資源、資本與土地，創造出最大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的原則。這個原則最初是英國帝國主義占領他人土地及運用他人資源的合理化托辭——夾帶著現代化的生產工具與技術，英國人正是從有限的資源、資本與土地，創造出最大交換價值的不二人選。[14]英國人經由武力占領的方式在其殖民地推廣了資本主義，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更跨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以非武力的方式促進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藉由金援的方式，美國將其附屬國資本主義化，一方面開發新興的消費市場並利用其廉價勞動力，以利美國資本的累積，另一方面積極推銷自由市場與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意圖創造出一個全球的「資本帝國」（empire of capital），而本身在其中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15]

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步兵，不再是軍隊，而是強大的資本。戰後的日本、南韓、臺灣都是經由美國的引導與援助，被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環。在這個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帝國內，各個國家機器相對獨立地扮演發展、指導與控制地區經濟的角色；而各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至少在原則上，不存

13 新殖民主義一詞於 1961 年即被用來討論後殖民政治，尤其在 1965 年迦納領導人 Kwame Nkrumah 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中得到清楚的闡釋。然而正如 Robert Young 簡要的評析所指出，新殖民主義常常成為一個含糊籠統的詞彙，忽略各個殖民情境的細部差異；新殖民主義也比較適合描述如非洲的新獨立國家的政經情境，而非指涉一般的經濟帝國主義的運作。至於臺灣是否有如這些非洲國家的新殖民情境，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議題。見 Robert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48.

14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3), 89-109.

15 同上註，頁 154-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武力脅迫的關係，而是經濟上的合作伙伴與競爭對手。在資本帝國內，各個國家與企業依循市場機制，彼此合作或競爭，但都以累積資本為最終目的。然而，全球的市場並非公平的競爭場域，資本的多寡決定一個國家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以美國為領頭羊的默契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避免內鬨，「分享核心區域內資本主義密集整合的利益」。[16]雖然彼此不存在直接的武力脅迫，但並不表示武力就不重要。恰恰相反，美國的超強武力，一方面可以藉由古典殖民主義的方式，軍事占領某些中東國家，以獲取所需的天然資源，如礦產與石油；一方面，藉由戰爭對盟國展現自己武力的優越，以嚇阻盟國的可能挑釁，鞏固自身的全球霸權。[17]

回到東亞的獨特脈絡，美國二戰後到1950年這段期間不相連貫的外交政策，因為韓戰（1950-1953）的爆發而確定：美國正式介入韓戰，導致朝鮮半島的分裂；加速日本經濟的復甦，以避免共產勢力的染指；恢復對國民黨在臺政權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以臺灣為防堵中共擴張的最前線。[18]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退守臺灣，先是利用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的基礎建設，後又借助美國的經濟援助發展經濟。1950年代以農村剩餘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一方面對日本出口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另一方面以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扶植當地資本。[19]戰後日本在美國的援助下，經濟快速發展，但1960年代末葉的工資與地價上漲、限制污染等原因，迫使釋出勞力密集的出口訂單。[20]臺灣此時以出口導向的政策和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吸引美、日的跨國公司將勞力密集的生產線移至臺灣；臺灣遂成為世界加工廠，將日本進口的半成品加工再銷往歐美，形成美、日、臺的三角貿易關係與經濟同盟。[21]因此，不同於古典殖民主義立基於武力的經濟剝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所指的經濟關係乃是在美國金援的主導下，臺灣接

16〔英〕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新帝國主義》（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頁 47。

17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159-64.

18〔美〕約翰．梅森（John W. Mason）著，何宏儒譯，《冷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59-61。

19 林鐘雄，《臺灣經濟發展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頁 25-87。

20〔日〕北村通子，〈工業化的承擔者：跨國公司的投資〉，收入〔日〕谷浦孝雄等著，雷慧英譯，《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臺北：人間出版社，2003），頁 108。

21〔日〕笹本武治著，〈工業化的開展過程〉，收入〔日〕谷浦孝雄等著，雷慧英譯，《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頁 23-26；瞿宛文，《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臺北：唐山出版社，2003），頁 275-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受、模仿並或多或少轉化其資本主義體制之後，成為其資本帝國中的一員。

光復後的臺灣脫離了日本的古典殖民統治，但是否成為二戰後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次殖民地或經濟殖民地，已是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爭論不休的問題，也難以在這裡有任何定論。[22]不過文學批評本非社會學研究，上述的討論目的在釐清本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詮釋框架：《玫瑰》中董斯文聯合四大妓院集資，以企業經營的手法，藉由商品外銷（亦即與美軍進行性交易），以創造最大的交換價值的意圖，是恪守資本主義的營利邏輯下的行為。資本主義隨著美國，在二戰後進行全球性的傳播與擴張，並在臺灣落地生根、成長茁壯。因此，資本主義全球化指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臺灣的傳播與複製，如勞雇關係、專業分工與利潤極大化的原則；以及資本主義文化的輸入與深化，包含理性計算的精神、企業無限擴張的雄心與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心態。以上種種現象都在《玫瑰》一書中有生動的描寫。

22 如王拓認為臺灣由於資金、設備和技術都必須仰賴進口，而導致經濟上被美日所控制，屬於一種無法自主的經濟殖民的情境，見〈「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收入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78），頁 578-79；陳映真亦認為臺灣所謂的「發展」和「成長」「是更多地按照支配性的外國經濟而不是本國經濟的需要所促成」，見《西川滿與臺灣文學》（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頁 77。後來學者對當時經濟殖民或依賴理論的檢討與批評，見〔美〕Richard E. Barrett and Martin King Whyte 著，丁庭宇、馬康莊譯，〈依賴理論與臺灣：一個異例的分析〉，收入丁庭宇、馬康莊編，《臺灣社會變遷的經驗》（臺北：巨流出版社，1986），頁 55-86。針對依賴理論的一般性批判，見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0), 161-99. 另外，Bill Warren 在 1970 年代即指出依賴理論的內涵其實是國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並認為（回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說法）帝國主義乃是促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有效方式，因此帝國主義在革新「前資本主義社會」（pre-capitalist society）的生產關係與文化上有其正面與進步的意義。參見 Bill Warren, “Dependency Theory as Nationalist Mythology,” i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0), 157-85. 建立在臺灣的經濟殖民情境的預設上，後殖民批評隱含國族主義、去殖民的意圖與多組的二元對立的詮釋框架，如帝國與殖民地、中心與邊陲、獨立自主與依賴、跨國公司與本土資產階級等等。當後殖民批評聚焦經濟「殖民」時，關注的焦點自然是外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本文提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詮釋角度，則關注「經濟」層面，因此聚焦階級、資本主義體制與文化，以及相應的小說內容與形式表現。至於 1960 與 70 年代的臺灣社會到底是不是「殖民」情境，經濟殖民的論述如何影響當時作家的創作，以及經濟殖民的預設如何影響後繼研究者運用後殖民理論，這些複雜的問題有待來日另文處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殖民主義與性別政治千絲萬縷的糾葛，已經有許多學者討論過。在此，本文僅僅想假設三種性別政治的情境，以對應上述三種殖民／後殖民的經濟關係，進一步釐清《玫瑰》中色情交易的脈絡與可能的隱喻意義。在古典殖民主義時期，殖民地被視為處女地（virgin land），殖民者占領土地，從事生產以滿足帝國的消費需求。以性別關係的語彙來翻譯，殖民地相當於臺灣的慰安婦，在武力脅迫下，貢獻身體，以滿足日本男性士兵（殖民主）的（性）需求——武力占領與暴力強迫是二者的相同之處。新殖民主義的經濟關係比較像是金錢買賣的婚姻：妻子必須依賴丈夫的經濟支援，正如殖民地不得不仰賴帝國的援助來維持生計，丈夫則以妻子的性服務為回報，「婚姻是長期的賣淫」適切地描述這種情況。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貿易行為可以比作性交易，但前提是性交易本身不涉及強迫，而是出自買賣雙方的自由意志。在全球性旅行的風行下，地方的妓女以身體作為商品販售，賺取個人所得，發展地方經濟，為國庫增加外匯收入是其典型。

要釐清小說中的美國大兵與花蓮妓女究竟應該屬於上述何種性別隱喻的關係，我們不只必須參照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要考量小說選擇哪一個層面的現實以進行再現。二次大戰後，美國先後介入亞洲的兩場大戰——韓戰與越戰，而為了滿足駐外美軍的性與娛樂需求，在越南、韓國、菲律賓、泰國、臺灣、沖繩與日本設置休閒娛樂中心（rest-and-recreation facilities），合法化性交易，並對買春女子加以控管及施加性病檢驗。[23]一方面，休閒娛樂中心近似日本二戰時在東南亞各地設置的慰安所，亦可說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一種性剝削。但另一方面，娼妓可說是人類最古老的行業之一，而大規模的旅行卻是現代中產階級興起的產物；跨國的旅行更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其中美軍至東亞從事旅遊與性交易，可說是現代「跨國性旅行」（transnational sex tourism）的先驅。因此，美軍來臺嫖妓，既可作為殖民主義的象徵，亦可以純粹的性交易來看待，端看詮釋者的角度。然而，《玫瑰》避開了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描繪，既沒有描寫美方介入強迫成立休閒娛樂中心，也沒有設定到花蓮度假的美國大兵是為了性消費；反而是花蓮的地方人士，自己迫不及待地開起美式酒吧，意圖將美軍單純的觀光旅遊行程轉化為性旅行，以增加美軍的消費。在這樣的情況下，美方並無政治、軍事或經濟力的介入，自然也就沒有強迫的成分或殖民脅迫的意味。王禎和如此選材，正說明他所要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在地資本主義的盲目發展，而非直接針對外來的殖民主義，也因此傳統色情產業的企業化、現代化與由內銷轉為外銷導向的經濟模式，以及衍生而來的問題才是故事關注的焦點。

23 Saundra Pollock Sturdevant and Brenda Stoltzfus,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Prostitu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in As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3), 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理性化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色情行業歷史悠久，但是如果傳統的經營者僅僅期望產業能夠在穩定中求成長，則現代化的企業經營強調資本與勞力的集中，快速產生龐大的利潤，並將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再轉為投資資本，試圖擴大產業以增加營收。作為一個現代企業的經營者，更必須對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與市場機制有一番理性的理解。對資本主義最經典的分析當屬馬克思理論，而董斯文作為一個專業的企業經理人，在經營與治理上往往呼應馬克思的分析。首先，開班訓練吧女在董斯文眼中是「開廠製造產品」，參加訓練的妓女便是製造商品的原料。[24]因此他召集了花蓮當地的「四大公司」（四間甲級妓院），以獲取充足的原料來源，並將之去蕪存菁，如身高必須155公分以上、胸部要像文旦柚一般大、經期必須避開美軍的度假時間。[25]四大公司的合併案正是所謂的資本集中的過程：龐大的資金一方面可以設立一個全新的、史無前例的大型美式酒吧，另一方面可以負擔生產商品過程中的大筆開銷。如董斯文所說，在原料取得之後，「第二步要有標準的生產機器」（亦即馬克思的生產工具）。因此，他計劃找來專業教師以提供相關的訓練課程，包括英語、舞蹈、歌唱、國際禮儀須知、美容與化妝、美國文化簡介、中國文明概論、生理衛生、法律問題、調酒藝術、基督教祈禱方法等等，目的在於提高學員的「文化氣味」。[26]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亦即經由專業加工與產品升級，增加商品販售的附加價值，而這些加工過程的花費，最終將「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以確保收益可以超越投資的支出。[27]

如果從官僚體系的組成與專業分工的法則來看以上的過程，我們可以說四大公司的老闆本來是傳統產業的經營者，但在董斯文的「感召」下，搖身一變成為現代意義的資本家。他們負責原料的提供與購置生產工具所需的資金，並透過公司的「併購」，擴大其產業規模，目的在不斷提高營收，而妓女則是原料，在加工過程中被轉換為有價商品（吧女）。當然，妓女本身也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無產階級工人，她們唯一能做的只有出賣勞力，以換取薪資維持生活。故事中提供吧女訓練課程的老師，包括負責法律事務的律師、安全檢驗的醫師，都是企業經營中不可或缺的技術官僚。全書的靈魂人物董斯文，則可以說是總經理；如果當時有CEO（企業執行長）這個名詞的話，王禎和大概不會吝於用

24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頁 167。
25 同上註，頁 74、頁 94、頁 98。
26 同上註，頁 168。
27 同上註，頁 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形容董斯文。

由於董斯文是王禎和嘲弄的主要對象，王德威曾以「好吃、好色」來形容董斯文。[28]在中國的小說傳統中，好吃好色常常是丑角所具有的負面人格特質，如《西遊記》中的豬八戒即是這樣的典型人物。董斯文也的確是個像豬八戒一般肥胖的人物，照道理來說，應該好吃，而且經營妓院，必然好色。然而正如高全之指出的，董斯文並非好吃好色：整個故事並沒有描寫他大吃的動作，而他也不好色，只是一心一意要把酒吧賣淫的事業辦好。[29]他不論多忙多累，每天必定服用三千毫克的維他命C；放在冰箱超過一星期的菜蔬絕對不吃，怕不新鮮；塑膠的餐具與烤肉絕對避免，怕致癌；每天晚上以牙線仔細清理牙垢，好預防牙周病。至於生理的需求，董斯文因為怕感染性病，從不嫖妓，而是有計劃、有節制地，每月初一、十五自己鎖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自瀆。[30]從對食色的自我嚴格控制來看，董斯文表現了對自己身體健康的反思性（reflexivity），亦即在知識爆炸的情況下，飲食的選擇與必須承擔的風險（risk）成了日常生活政治的一部分。[31]他更是將自己的身體當作一個可以形塑的客體，如同一件企劃案（project），根據專家學者所提供的健康知識來執行。若說董斯文是好吃好色，他大概要用他的口頭禪反駁：「的相反」。

當然我們可以說董斯文膽小怕死，有一種對疾病的過敏症，然而董斯文的確表現了一種禁慾精神，以嚴格的態度規訓自己的身體，就如同他嚴格地規劃手下經營的企業。根據韋伯（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所說，十七、十八世紀新教徒自我規訓的態度與全心投入工作以榮耀神的理念，形成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礎石。資產階級商人認為只要財產的使用不違反道德，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從事商品與金錢的交換以謀取利潤；而禁慾主義鼓勵人們勤儉，一方面防範過度消費，以免褻瀆了勞動以榮耀神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勤儉不只將私人財產合理化，也必然導致資本的累積。[32]在世俗化的過程中，新教倫理的宗教內涵逐漸淡化、消失，但禁慾主義的精神，一種自我克制、戰戰兢兢、理性管控的態度依然不斷延續。

---

28 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頁 171。

29 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頁 21。

30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7-18。

31 對反思性與現代性的討論，見〔英〕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縣：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92-96。

32 〔德〕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唐山出版社，1991），頁 139-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董斯文的「好吃」並非為了口腹之慾的滿足，而是作為他全心投入事業的必要手段：

> 吃飯時，他又神來一筆地想到：今天他所擔任的使命，所扮演的角色，啊啊！是何等的重要啊！在這一段期間他絕對不可以中途累倒或病倒。不病倒累倒就得端靠充分的體力。充分的體力就得端靠充分的營養，而充分的營養又來自豐盛的飲食。於是他除了吃A級快餐外，另外多叫了個荷包蛋，一盤嘉義蹄膀，和一杯鮮乳。[33]

這一段明白地揭示了個人飲食、身體健康與企業經營的因果關係，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是企業家全心工作的必要條件，而營養豐富的飲食又是身體健康的前提。董斯文表面上看來好吃，但實際上不是毫無節制的暴飲暴食；正好相反，他所表現出來對於飲食的規劃與王永慶每天慢跑的規律態度其實相差不遠，都是一種禁慾主義的精神。至於對性的控制，也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禁慾精神。韋伯認為「『性』是人類社會中最強烈的非理性成分，它同時也是阻礙個人理性追求經濟目標的最大障礙」。[34]董斯文並不只是對自己的性需求進行某種程度的壓抑，也將性慾的滿足方式理性化——他從不嫖妓，而是定時定量地自瀆。

綜觀董斯文的行為與意圖，他對企業經營的投入與熱忱並非為了私利（個人財富的累積），而是為了「公利」，亦即公司所能獲取的利潤。在所有人物之中（包括妓女），董斯文或許是最不看重個人利益的人，因為對個人財富的貪慾根本背離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對董斯文來說，比利潤重要的是可以在企業的發展中獲得成就感，實踐自己的理念，如韋伯所說：「一個人是為了他的事業才生存，而不是為了他的生存才經營事業」。[35]在這一點上，董斯文不同於傳統的經營者：傳統產業的經營者，大多滿足於現狀，只求自己的產業能穩定地創造利潤，以累積個人財富，確保自己優渥的生活。新一代的企業家，則不斷擴展產業，並將所得的利潤再作投資，擴大企業規模才是他們最終的關懷。因此董斯文以佛蘭克林的名言「以錢滾錢，以錢賺錢」，亦即「本錢下得越多，賺回來的錢也就越多」的說法，來說服四大公司的老闆，進行「擴廠」

33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07。

34〔德〕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社會學文集》（*Essays in Sociology*），引自〔英〕艾恩・瓦特（Ian Watt）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70。

3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產品品質的提升。[36]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董斯文扮演了文化掮客與知識傳播者的角色，試圖將美式資本主義的經營理念引進臺灣，雖然有時遭到妓女們的質疑，但他的確也藉此重新組織、擴張本土產業，與在地資本家共謀，助長了資本主義營利邏輯的全球化。

唯有在企業可以不斷成長、革新、升級的情況下，企業經營才能不再只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可以投注一輩子心力的志業。難怪董斯文常常為自己源源不絕的靈感而沾沾自喜（自認「神來之筆」），因為企業經營實現了自己的雄心壯志。而且，董斯文不同於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極盡所能剝削無產的勞工（妓女），只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剩餘價值，而是有些不計成本地照顧勞工的福利。例如，他要求老闆「把學員當子女看，愛護學員，照顧學員，重視學員的身心健康，注意學員的工作環境」，甚至要求四大公司老闆在學員受訓階段發放「不接客獎金」，以確保商品在出售前的安全衛生。[37]董斯文還要求出資者向大同公司的偉大理想看齊，亦即「創造利潤，分享大家」。這樣的概念和現代企業發放員工持股與年終獎金的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企業以營利為目的，但董斯文卻絕對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而唯有不自私自利的經營者，才能為企業創造永續發展的條件，謀取長期而言的最大利益。

在故事中大鼻獅不斷稱讚董斯文是一個「心思細密」的人，事實上他的一切經營策略都是依照市場的供需原則，經由理性計算推論得來的，以富有遠見與小心謹慎的態度來達到經濟上的成功。如前所述，他要求每一個妓女身高必須155公分以上、胸部要像文旦柚一般大以投美軍所好。[38]他更企圖將商品「多樣化」以滿足顧客不同的偏好，像是招募三十歲上下的妓女，以提供給那些想媽媽的美國大兵，或增加男陪侍以滿足美軍裡的同性戀者的需求。[39]董斯文以為，「根據最近美國權威雜誌刊登的統計數字——美國成年男子人口中HOMO CASE估計約有四分之一」，而三百個來度假的美國大兵中，就有七十五個同性戀。如果每個GI花在酒吧的平均金額是一百美元，總收入便是七千五百美元，折合臺幣約三十萬，可以買兩棟洋房。[40]觀察以上的推理，我們可知對董斯文而言，雇用男陪侍是否「傷風敗俗」並不在他的考量內；[41]只要是經由理

36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69。
37 同上註，頁 177、頁 188。
38 同上註，頁 74-94。
39 同上註，頁 99。
40 同上註，頁 136。
41 同上註，頁 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計算，能為企業創造最大利潤的事，他將義無反顧的去執行。

齊美爾（Georg Simmel）在《錢的哲學》一書中認為貨幣的抽象性與缺乏獨特性的特徵，使得經濟活動完全依賴理性計算的原則而運作，以至於參與經濟活動的人，也將在理性計算中失去人的個別性（individuality）。[42]簡而言之，買賣關係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關係，不牽涉任何私人情感或倫理問題。因此，聽到董斯文想要提供「媽媽型」妓女的點子，四大公司老闆中的矮仔姬準備找她二十九歲的侄女下海；紅毛姐的養女，正巧丈夫剛去世不久，也被要求來幫忙；大鼻獅甚至鼓勵他的姘頭阿恨重操舊業，只為賺美軍的鈔票。同樣地，對於董斯文增加男陪侍的要求，四大老闆之一的黑面李，自告奮勇要「獻腳倉」（臺語音譯，亦即「獻屁股」的意思）。[43]大鼻獅則說可以叫他讀大學的兒子，甚至他的同學來兼差，他說：「一來他們可以藉這個機會練習講美國話，二來又可以賺美金，怎麼會不肯呢？這是有錢可賺的頭路囁！」。[44]這種「唯利是圖、大利滅親」的態度，其實也就是齊美爾所說的，在經濟行為中經濟關係排除了倫理感情、理性計算取代道德考量的現象，然而個人自由似乎也在自由交易中得到相當程度的實現。[45]

一般觀點認為妓女在本質上是父權體制下的受難者與被剝削者，然而從性工作的角度來看，從娼是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下的純粹買賣行為，並無不同於工人出賣勞力以換取所得。在沒有人蛇集團與黑道的暴力脅迫下，從娼可以是婦女自己選擇維持生計或改善生活的手段。王禎和小說中的娼妓角色，幾乎沒有以無力受害者的形象出現（如白先勇〈孤戀花〉與李喬《藍彩霞的春天》中的受暴妓女），[46]反倒是充滿生命力的女性、狡獪的生意人與技藝高超的服務人員。王禎和〈素蘭要出嫁——終生大事〉中，花蓮溝仔尾的妓女阿清官，透過技術指導、熱情挑逗及器材輔助，讓處男小包確認自己的性功能正常，得以安安心心地結婚。[47]《玫瑰》雖然提到妓院老闆如何懲戒妓女而不留下痕跡，但故事描述的妓女可以為了拉客，去抓日本人的睪丸，為此董斯文預備開設國際

42 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ed. David Frisby, trans.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0), 444.

43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91。

44 同上註，頁 192。

45 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297-303.

46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1983），頁 143-161；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出版社，1997）。

47 王禎和，《人生歌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7），頁 3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禮儀的課程，教育妓女以免「砸了（臺灣）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的聲譽」。[48]另外，一位妓女不到三分鐘就把「事情」辦好，還能讓嫖客十分滿意；[49]紅粉樓的王牌小圓圓，就像「電視臺養的那款大牌歌星」，如果得罪了她，「要是伊翻臉不認人，轉到別家去，那不是因小失大」，大鼻獅曾如是說。[50]在最後的例子中，妓女與老鴇的關係相當於員工與雇主，是純粹的勞資契約關係。而且如果從純粹的利益交換來看，身體作為商品、賣春作為工作，則妓女作為無產階級勞工與妓院的擁有者（資本家）有著合作或共謀的關係，同樣奉獻心力於資本／利潤的累積，同樣對臺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功不可沒。

四、國族寓言之外：同性戀與階級差異

根據邱貴芬的後殖民閱讀，「臺灣男人加入賣春行列之時，《玫瑰玫瑰我愛你》裡的臺灣也轉化成一個女人國：臺灣既是美國的次殖民地，臺灣人民面對美國大兵時，不管男人女人，妓女非妓女，都扮演被嫖的女性角色！」。[51]男娼的角色在邱貴芬的閱讀中是臺灣男人女性化的象徵，其閱讀方式呼應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謂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根據他的說法，第三世界面臨或者曾經遭受殖民情境，使其文學帶有反殖民的國族主義色彩，因此第三世界文學必然是寓言式的，亦即「故事中的私密的、個人的命運永遠是公共的第三世界文化與社會中抗爭情境的寓言」。[52]對於熟悉無深度、遊戲式的後現代主義文學的西方讀者而言，這樣鬥爭式的文學不但是陌生的，更是「令人恐懼的」（frightening）。[53]邱貴芬的詮釋明確指出《玫瑰》中批判與對抗的含意，駁斥僅僅作為嘉年華會式喜劇的說法。然而在國族寓言式的解讀中，為了使殖民地臺灣等同於妓女，「妓女」所涵蓋的範疇必須擴大到足以包括所有臺灣人，所以男娼是妓女，甚至非妓女如皮條客與妓院老闆，也必須被解讀為被嫖的女性化角色。如此一來，幾乎所有《玫瑰》中的角色均成了象徵意義上的「妓女」。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早指出隱喻（或象徵）本是以一物替代

48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39。

49 同上註，頁 92。

50 同上註，頁 96。

51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頁 196。

52 Frederic Jameson,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1986): 68.

53 同上註，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一物，異中求同的修辭方式，故以上的寓言式解讀有其合理的慣例。[54]異中「見」同需要詩人的天才，但「去」異存同也意味著抹除差異，隱喻的洞見與盲點乃是一體的兩面。

首先，在異性戀的霸權運作下，經典作品中同性戀的主題常常被批評家刻意忽視、置換或淨化，屈原香草美人的隱喻可能就是一例。同理，故事中的男娼若只是作為妓女的隱喻，妓女又作為被殖民者的隱喻，則同性戀的議題可能便在求同的邏輯中面目模糊。的確，在一些當代臺灣小說，如王禎和的《美人圖》中，敵人被異己化為「同志」（homosexuals），並透過國族寓言化的表意系統，象喻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55]因此，國族寓言式的閱讀方式有其合理性，但酷兒式的閱讀策略鼓勵讀者有時不妨反其道而行，透過恢復《玫瑰》中男娼的性別身份，正視小說中男同性戀的子題，並觀察此一子題如何顛覆了剝削與被剝削者的對立關係。

針對小說中的同性戀情節，紀大偉指出兩種主要類型：一是「『具體呈現』一個愛好年輕男體的有婦之夫惲醫師」，二是以獲利為目的，凝聚而成的「想像的共同性戀體」，亦即小說角色們所想像的、在美軍酒吧中的男陪侍社群。[56]回顧小說本身，董斯文增加男陪侍的想法，其實是他的同學惲醫師所啟發的。當時，惲醫師正在診所內對一位俊美的少年病患李發育進行健診：惲醫師不但要李發育脫掉全身衣服，目光「留連在少年光溜溜的身上」，還借著觸診的機會肆無忌憚地觸碰少年私處。[57]當惲醫師想幫少年以手淫取出精液化驗時，董斯文忽然想到男娼陪侍的點子。事實上，董斯文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同學惲醫師的同志情慾，藉由看診性騷擾男病患，正是他「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手段。[58]在異性戀霸權的壓迫下，有妻有子的惲醫師也只能以假公濟私、暗渡陳倉的方式來滿足他的斷袖之癖。

四大老闆之一的黑面李大力支持董斯文的點子，並自願充當男陪侍。他的自願下海，可能是純粹為了經濟利益，但也有可能暗示他的同志傾向。在同性

54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4），頁 168-169。

55 朱偉誠，〈國族寓言霸權下的同志國：當代臺灣文學中的同性戀與國家〉，《中外文學》第 36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78。

56 紀大偉，《正面與背影：臺灣同志文學簡史》（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頁 112。

57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23。

58 同上註，頁 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戀不被容許的臺灣社會，黑面李滿足情慾或「出櫃」的方式，只能與惲醫師一樣，「以合法掩護非法」，以肉體買賣的純粹經濟行為掩蓋他對男色的渴望。雖然，黑面李的提議，因為年齡限制而被董斯文否決，但假如黑面李真的成了男娼，並與美國大兵發生性行為，則嫖客與妓女，不，與妓男的關係又會是如何？究竟是黑面李嫖了美國大兵，或者美國大兵嫖了黑面李？如果黑面李不但賺了美國人的錢，還滿足了自己的慾望，那作為娼妓的他，是否還是被剝削者的角色？同性戀的子題，尤其是黑面李作為一個未出櫃的同性戀者的角色，顛覆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立，也使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論述顯得問題重重。

其次，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市場體系中的階級關係與權力不平等，也容易在同是被殖民、被剝削的「臺灣人」的集體身分中消失不見。殖民的印記在每個臺灣人身上深淺有別，故不能一概而論地宣稱他們有相同程度的精神創傷或奴性，例如故事中的錢議員，因為所處政經地位的不同，很難說是個被殖民者。事實上，《玫瑰》除了在經濟層面刻劃出企業經營的本質與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外，王禎和更藉由錢議員的角色探觸官商勾結的問題。錢議員運用政治力將公路局的路線一條一條取過來給民營的海星客運，而海星客運則以乾股回報錢議員；同樣的，錢議員為即將開張的美軍酒吧弄到執照，所得的報酬是百分之二十的乾股。擴大來說，國家機器在資本主義體制運作中常常扮演同謀者的角色，不論在地或跨國企業都必須有當地政府的核准與政治力的支持，有時還需要軍事力或警察權的積極介入。譬如說，錢議員的律師就曾威脅訓練班的妓女說：「罷工是犯法的，是要判死刑的」，隱隱點出國家機器作為勞工的壓迫者與財團的共謀者的角色。[59]

錢議員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分子，很難被歸類為被殖民者、女性化或去勢男人的角色。的確，在臺灣民主的選舉制度下，錢議員無法永遠保持壓迫者的姿態，至少他需要在適當的時刻扮演祈求者的角色。作為議員候選人的錢老大，為求知名度與選民的選票，不惜在政見發表會上脫光衣服，以表示「上天下海敢做敢碰，你選我絕不錯」，而讓臺下的選民品頭論足一番：「還不小哦！」、「哦！算是大號的囁！」、「跟阿凸仔（俗稱美國人）差不多哦！」。[60]當錢老大作為要求選民認同的乞求者時，他的行為被等同於脫衣舞女郎，是相對而言較為女性化與缺乏權力的角色，但是他跟美國人一般大的陽具，證明了他的男性雄風，也證明了他的魄力，因此難以說是去勢的男人。不幸的是，他在當選之後，魄力被用來營取私利，而非為人民爭取福利，更可能與資本家同謀成

59 同上註，頁 214。

60 同上註，頁 45、頁 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壓榨弱勢的迫害者。

王禎和曾說自己原本的寫作計劃，是要描寫妓女成為吧女，一直到美軍來了，吧女如何招待美軍以及酒吧老闆如何迫害吧女的整個過程，但在動筆時大幅改動，只寫到酒吧的「懷孕成胎」。[61]因此，錢議員或四大妓院老闆還沒有以迫害者的角色出現。然而在王禎和另一篇〈伊會念咒〉中，錢議員成了章議員，以各種不人道的手段迫使一個育有幼子的寡婦賣出房子，以便擴展自己在隔壁經營的書店面積（都更？）。在遭到婦人拒絕後，章議員運用政治力，先是將她的房子認定為違章建築，後又硬把她的土地列入道路拓寬的範圍內（以「公共利益」之名徵收土地？）。她在有理說不清又投訴無門的情況下，漸漸失去論辯的能力，而僅能喃喃自語，彷彿念咒。[62]富人因有錢而有權，擁有了權力後，卻濫用權力，只為獲取更大的私利。伊不只是受經濟力與政治力的雙重迫害，更受到議員的「象徵暴力」——議員不為人民喉舌，反而運用其知識與論辯能力壓迫弱勢，閹割了他們運用語言抗辯的能力。

在〈香格里拉〉中，章先生是市民代表，但卻同樣對寡婦阿緞施以象徵暴力。阿緞為了讓即將參加聯考的兒子對時事有所了解，在夜裡特地前往代表家中，詢問誰是尼克森的競選對手，但卻遭到一陣奚落。她捂住嘴不叫哭出聲來，沒命地跑回家，直奔到房間，在黑暗裡啜泣起來。[63]人民選出來的代表，不用他的知識為人民喉舌，反而以其知識權力對下層階級施以象徵暴力，使他們覺得低人一等，似乎以此強化自身作為統治者的優越感與合理性。阿緞雖然不失為一位堅強的母親，但在堅強中處處流露一股知識不夠的自卑感與象徵暴力下的挫折感。她唯有寄望下一代能經由知識的取得（升學），達到階級流動的目的。

在《玫瑰》一書中妓女較少以被迫害者的形象出現，但在董斯文英語教學的那一幕中，我們同樣看到知識分子挾其知識的傲慢，對較無知識的弱勢者施以象徵暴力。當他要求學員之一的李淑女說「My name is Patricia」時，李淑女竭盡所能卻只能說成「罵你即是怕你去死呀」。[64]在過程中董斯文不停地罵她「笨蛋」、「白癡」、「蠢豬」，讓「李淑女突然地哭出來」，大喊「我不會講啦！我真的不會啦！真的不會啦！」。[65]李淑女因為無法正確複製知識分子

61 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頁 256。
62 王禎和，《香格里拉》（臺北：洪範書店，1980），頁 31-60。
63 同上註，頁 179-214。
64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237。
65 同上註，頁 2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語言，而當眾受到羞辱；在象徵暴力的肆虐下，李淑女再一次否定自我的價值，而自我否定將反過來確認自己作為一個與知識分子階層永遠沾不上邊的她者。當然，李淑女不成功的複述或模仿，可以視為對壓迫者語言的諧擬（mimicry），因而具有顛覆與解構的潛能。[66]只是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中，單單語言的嘲諷是否能改變任何社會不公，大概是連王禎和也不敢奢望的。也許這令人無言以對的局面，僅僅能以「讓人間多一點笑聲」來作暫時的抒解吧。[67]

五、社會主義寫實與喜劇的反諷形式

對於王禎和作品的美學特質自來有許多不同的討論，呂正惠認為王禎和有如一個自然主義作家，以客觀的態度，描寫生命的卑微與不堪。[68]王德威將王禎和置於中西方的喜劇傳統中來檢視，認為《玫瑰玫瑰我愛你》是在追求「渾然忘我」的笑鬧，「在將人生百態一視同仁之際」，「顯現一種宏大悲憫的胸懷」。[69]透過前文的分析，我們或許可以說，王禎和對社會的細膩觀察和剖析與「把歡笑撒滿人間」的喜劇意圖並非相斥而是相輔相成。喜劇的功用或許不只是如王禎和自述的「讓人間多一點笑聲」而已，而是像姚一葦說的如一面鏡子：在嘲笑了這些卑微的小人物與無恥的大人物之後，我們可能驚覺，我們所嘲笑的對象竟然是我們自己。[70]

《玫瑰》的喜劇本質因此近似於王禎和最欣賞的導演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的喜劇電影。例如《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中工廠老闆為了節省工人的用餐時間，而發明了一種「速食機器」，不但可以自動餵食員工食物及飲料，還以機器手臂托著用餐者下顎幫助他快速咀嚼。看到流浪漢（卓別林飾）被餵食的尷尬模樣，大約很少人不會發笑，然而坐在電影院裡，吃著爆米花的我們和流浪漢真有不同嗎？所謂的速食如漢堡、薯條，不正是為了忙碌的上班族而發明的，用來減少他們的用餐時間。如同電影中「速食機器」幫助用餐者咀嚼，速食工業代替用餐者執行咀嚼的任務：使用機器事先將牛肉絞碎製

66 對於諧擬（mimicry）作為被殖民者的抵抗策略，見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85-92.

67 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頁 261。

68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頁 76-78。

69 王德威，《眾聲喧嘩：三〇年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頁 240。

70 姚一葦，〈我讀《玫瑰玫瑰我愛你》（代序）〉，收入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肉餅，配上容易咀嚼的軟麵包，最後加上炸到酥軟的薯條，讓用餐者更容易下嚥。在《摩登時代》裡，我們都是勞動力的提供者，資本主義依據其營利邏輯要從我們有限的身體與生命，創造出最大的交換價值。當卓別林於1936年拍攝《摩登時代》的時候，麥當勞兄弟還未開設地區性的「麥當勞兄弟漢堡汽車餐廳」，更遑論以速食產業風行全美，以至於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國餐飲業者，然而因為卓別林掌握了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所以上面看似荒謬的鬧劇片段，竟然在數十年後成為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71]

同理，《玫瑰》中的吧女及妓院不過是背景或手段，王禎和意圖述說的是一則資本主義的寓言，可以讓讀者反思書中可笑的色情產業和臺灣本土企業的雷同之處。以臺灣的石化企業為例，其產品大多數供外銷，為臺灣賺取外匯，提供地方就業機會，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但同時帶來環境污染並影響在地居民的健康。臺灣的石化企業何嘗不似《玫瑰》中的賣春公司，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之後，還要擴大經營，外銷賺美金？企業的盈餘看似雨露均霑：錢議員、董斯文、老鴇、妓女均能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準；同樣地，當石化企業有盈餘，資本家與公司員工自然有更多紅利，甚至當地的居民也能以回饋金的形式分享企業利潤。但是，問題在於收益分配的不當及風險分攤的不均。《玫瑰》中的出資者固然必須冒著投資賠本的風險（儘管色情行業似乎是一本萬利的生意），站在第一線的妓女不但要付出勞力，更需要冒著感染「西貢玫瑰」（梅毒）的風險，然而她們的所得卻是最低的。同理，石化企業的資本家，囊括大部分的利益，而環境污染的遺毒或可能的風險，卻由土地、基層勞工與當地居民概括承受。當然，我們別忘了錢議員的角色，因為他的介入，新建的酒吧才獲得縣政府的批准。同理，高污染的石化企業必須通過環評／環保署這一關，而企業所資助的政客便成了遊說團，使政府成為企業的保護傘。

以下的對應表應可使石化企業與妓院的類似性一目了然：

石化企業	美式酒吧（妓院）
資本家	四大公司老闆
執行長（總經理）	董斯文
技術官僚	律師、醫師、教師

71 對美國速食業的興起與發展，參見〔美〕艾瑞克．西洛瑟（Eric Schlooser）著，陳琇玲譯，《速食共和國——速食的黑暗面》（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2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地、工廠	酒吧
勞工（製作商品）	妓女（同時是產品）
國內外消費者（外銷為主）	國內外嫖客（美軍為主）
環境污染及疾病	西貢玫瑰／梅毒
遊說團	錢議員
環保署	花蓮縣政府

如同書中的老鴇將女人商品化以賺取美金，臺灣的石化企業不也是利用臺灣的自然資源、土地、勞工，生產商品以賺取外匯。因此《玫瑰》所講的並不僅是後殖民的國族寓言，更是一則資本主義的寓言——臺灣本土企業在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下興起後，僅僅以創造最大企業利潤為目的，物銷國外毒留臺灣。故事中的政客與企業主以花蓮受美軍青睞為受寵「得恩」，而被剝削的勞工／居民也常常要錢不要命，如同故事中的妓女即將對美軍／美金與梅毒高唱〈玫瑰玫瑰我愛你〉一般。小說開頭以基督教空間「得恩堂」為吧女訓練班的開幕地點，小說結尾又以在教堂中高唱〈玫瑰玫瑰我愛你〉作結，其中的反諷意味不言而喻。

偉大的文學作品產生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但同時也超越特定的歷史脈絡而有著更普世的意義；寓言或文學作為一種寓言（literature as allegory）本有其超越時代的潛能。因此《玫瑰》對二十一世紀的臺灣讀者仍有重要的教訓意義：當我們不斷強調全民拼經濟時，卻忽略弱勢團體與土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玫瑰》中可笑的人物其實正是我們每一個人。 經濟學家李維特（Steven Levitt）研究美國黑幫的販毒模式，認為與麥當勞販賣漢堡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他認為：「一顆蘋果，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裡頭竟然是橘子」。[72]同樣的，《玫瑰》一書中的妓院經營根本是真實世界企業經營的翻版，而王禎和的喜劇，用批評家的剖刀劃開，裡頭竟是「社會主義寫實小說」，不只批判、剖析了資本主義，嘲諷了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也試圖揭露或建構出社會關係的總體性。

值得進一步釐清的是，盧卡奇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總體性已經不再如古希臘或基督教世界具有內在性與封閉性，而是無限開放的，正如資本主義必然無限制地擴張一般。因此，總體性的把握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再可能；小

72〔美〕李維特（Steven D. Levitt）、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著，李明譯，《蘋果橘子經濟學》（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以上引文引自中文版的封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作為這個時代的史詩文學，唯一能做的只有在過程中不斷逼近「總體性」的理想：一方面，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這是小說家的倫理責任，另一方面，小說無窮無盡的敘事本質，正是小說家用以逼近總體性的最佳媒介。[73]如同布爾喬亞階級從封閉的傳統社會中解放，小說作為新興文類也從既定形式（given form）的束縛中解放，落入無限延伸的時間之流中。姑且不論盧卡奇的對錯，他的說法對我們隱含兩個重要的意義：其一，作為社會關係的總體性是動態的，而小說也必需透過具有時間性的敘事過程，以及人物的行動與互動揭露總體性。[74]換言之，本節透過美式酒吧與石化產業的類比，表列出社會關係的總體性，可能掩蓋了小說揭露總體性的「過程」（process）：《玫瑰》敘述的是酒吧「懷孕成胎」的過程，乃是透過主角董斯文的不斷奔走，才「逐步」拼貼出總體的社會關係；隨著政客、醫師、律師與妓女的加入，社會關係的總體性才逐步浮現。其二，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社會關係）是開放的、無限延伸的；試圖呈現現代總體性的小說也同樣具有開放性，所謂的結局必然是「暫時的」（temporary）。

小說故事沒有結尾，但作者仍然必須賦予小說一個結構，至少提供一個「結尾感」（a sense of ending），而這正是《玫瑰》一書中倒敘手法的妙用。全書以吧女訓練班開幕式為起始，以念基督教主禱文為閉幕式作結，真正故事發生的時間不過幾個小時，但透過倒敘、插敘的方式完成社會總體性的描繪。所謂開幕與閉幕既是小說的情節內容，也是敘述形式上的框架，一前一後包夾了社會總體性的描繪，一方面賦予小說一個結尾感，一方面又暗示故事（總體性）無限延伸的特質。因此，小說一方面以惲醫師與大家同念「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結束儀式，但同時董斯文還在想像未來美軍來花蓮，吧女們用英文高唱〈玫瑰玫瑰我愛你〉的場景。亞里斯多德定義的結尾是「跟隨於某事件之後，而無事件跟隨於它之後」，[75]但《玫瑰》的結尾不過是另一個故事的開頭；正是小說永遠有下一回的敘事特性，不只反應現代總體性的開放特質，也成了揭露、迫近總體性的不二媒介。

---

73 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29-83; J. M. Bernste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acs,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65-76;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60-205.

74 Georg Lukacs, *Writer &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1), 123-24.

75 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注》，頁 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為現代社會的歷史產物，資本主義與小說具有「同質異構」的特性：在強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中，企業家無視傳統、力圖創新、以謀求利潤為最終目標；小說家創作同樣講求「標新立異」、「前無古人」，如王禎和所說：「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每一本他寫的書，都應該是一再努力去開拓他才華的另項全新開始」。[76]因此，讀者應當不意外，本是英文老師的董斯文，會投入妓院的經營，作為「開拓他才華的另項全新開始」。創業與創作異構而同質，有如一個銅板的兩面，在《玫瑰》的敘事行進過程中相依相存。董斯文雖是王禎和筆下的創造物，但王禎和唯有透過董斯文的「創業」過程才能進行小說的「創作」。董斯文創業的過程正是《玫瑰》一書創作的過程：沒有董斯文源源不絕的創意，也就不會有《玫瑰》這本充滿創意的小說。當董斯文為自己的創意高呼「啊啊！真是神來之筆啊！」的時刻，不也正是小說家志得意滿的「神來之筆」？[77]更別提董斯文本人在小說中，是外文系畢業、擔任中學教師、後來到電視臺上班，甚至還得過文學獎，與王禎和的經歷互相影射，而有自我嘲弄的意味。[78]

小說乃是個人已經脫離自然、社會的現代個人主義的產物，故小說以問題人物（problematic individual）為敘事中心，以傳記（biography）、追尋（search）、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實現為內容／形式。[79]作為《玫瑰》的靈魂人物，董斯文的創業傳奇，也正是他跳脫既定生命軌跡，追尋、打造全新的自我身分（企業家）的生命歷程，呼應盧卡奇早期對小說形式的觀察。另一方面，具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小說形式，也必然導致敘事者的個體化。相對早期敘事（如《聖經》的〈約伯記〉）中客觀的、權威的、無個性的（第三人稱）敘事者，[80]《玫瑰》的敘事者宛如一個角色，在說故事的同時，常常以揶揄的腔調嘲諷故事中的角色，甚至根據高全之的說法，本身具有「自鳴得意、卑抑」的性格。[81]敘事者宛如一個角色，卻又不是小說敘事中的角色，而是小說角色的評論人，或翻譯、

76 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頁 257、頁 260。

77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243。

78 王禎和在和文堯的訪談中提及，自己「一向很注意身體的健康，平常對醫學新知與養身之道的文章也很仔細讀，並且遵照健康指示原則去做」，正如董斯文一樣。王禎和在小說中嘲弄知識分子，其實也有自嘲的成份。文堯，〈紅茶與冰淇淋——王禎和訪談錄〉，《大同雜誌》73 年 6 月號（1984 年 6 月），頁 16。

79 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60, 77, 80.

80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3-4.

81 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頁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諷刺、或加油添醋（如小說中以括弧出現的文字），拉開了讀者與小說人物，如董斯文、大鼻師、錢議員、惲醫師等人的距離，使批判與反思成為可能。因此，一方面創作者王禎和與創業者董斯文有等同／認同關係，均非「述而不作」的述者，而是強調原創性的現代「作者」（auteur）；另一方面，敘事者個體化為評論人，透過幽默諷刺的喜劇口吻，（代替作者）批判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臺灣「唯利是圖」、「大利滅親」的工商社會。《玫瑰》作為喜劇的曖昧性，正展現在敘事者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游移特質。

六、結論：在殖民與反殖民之外

本文以資本主義全球化取代後殖民主義的框架，切入王禎和的小說，希望挖掘《玫瑰》的其他深層意義。當然論者或謂當今橫行全球的資本主義只是西方的產物，而故事中的董斯文接受其運作邏輯時，就已經受到了經濟殖民，甚至資本主義的文化殖民，因此《玫瑰》中的批判亦是一種去殖民或後殖民的批判。這樣的論點的確可以成立，端看論者如何定義「經濟殖民」一詞。本文中古典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區分，雖然不盡完美，也可能簡化現實（一個國家的殖民情境未必不能是以上多種狀況的混合），但卻希望可以經由對比的方法釐清差異，為《玫瑰》的重要情節與人物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詮釋框架。本文想簡單總結「狹義的」後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之間的差異，目的倒不在以後者取代前者，而是認為二者的互相參照或許可以更清楚闡釋文學作品的幽微、曖昧與複雜之處。

首先，國族認同在殖民地的解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過分強調國族主義所扮演的反殖民角色，可能忽略了國族內部的壓迫與不公的問題。對於前者的關注，高全之已經明白指出王禎和作品中所流露的「民主焦灼」，亦即民意代表不為人民喉舌，反倒成為壓迫人民的幫兇。[82]《玫瑰》中的錢議員不但官商勾結以謀取私利，其手下更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律恐嚇勞工（妓女），要她們不得罷工或將收入匿而不報。〈伊會念咒〉中的章議員以各種手段迫使育有幼子的寡婦賣出房子。[83]這些情節指出臺灣社會裡階級壓迫的問題，也指向改造國家機器的迫切性。如果《玫瑰》中的妓女是最底層的弱勢，則上面的壓迫者並非美軍，反而是政客、資本家與知識分子，每一個都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不論是探討殖民主義中的性別權力結構，或是釐清殖民壓迫與性別壓迫的相似

82 同上註，頁 113-121。

83 王禎和，《香格里拉》，頁 3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都有助於我們了解二者的本質。然而，如邱貴芬在《後殖民及其外》一書中所說，「被殖民者=女人」（將被殖民者化為女人）的論述方法或隱喻，「混淆不同脈絡的壓迫……視性別壓迫為所有壓迫關係的典範，淡化了其他壓迫結構的特殊性，也因而產生不少缺乏對特殊歷史情境深入了解的謬誤解釋」。[84]將被殖民者等同於妓女的論述方法或隱喻，不只妨礙研究者對特殊歷史情境進行深入的了解，而且掩蓋了弱勢者常常受到多重壓迫的事實。

其次，後殖民主義往往為國家或人民的解放設立一個具體的壓迫者，以臺灣的歷史情境而言，此一他者可以是日本、美國、中國或甚至國民黨，但是卻忽略了所謂的「壓迫者」可以是一個彷彿無形，卻又無所不在的經濟制度。如本文所討論的，理性化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投資與風險計算、科層體制的建立、技術官僚的整合均表現出理性化的精神，目的在為企業創造最大利潤。但以營利為導向的企業常常罔顧社會責任，而使弱勢者曝露在危險之中。如本文所述，妓女的收入有限，但卻是感染性病的高危險群；石化企業為國家帶來經濟發展，但對在地居民與環境的傷害，卻不是金錢可以彌補的。不過，王禎和在《玫瑰》中也非一面倒地批評經濟發展。董斯文所計劃的美式酒吧若能順利開張，必然為地方帶來繁榮，提升妓女的收入與生活水準。為此，我們不只看到CEO董斯文為自己的理想全心奉獻、資本家與政客為了私人利益全心投入，甚至最低階的勞工妓女也積極參與，構築這一個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夢。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是一把兩面刃，它的確提升了企業的效率與營收，但也有非人性化的負作用，包含科層體制的壓迫、倫理關係的解體與利益分配的不均。因此，王禎和所探討批判的對象不止於具體的壓迫者，如政客與資本家，而是擴及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邏輯本身；經由他的社會主義寫實的喜劇，王禎和讓我們在全民拼經濟的狂熱下，重新省思韋伯對資本主義非人性化的警告：「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85]

最後，後殖民主義著重《玫瑰》中語言混雜的現象，並視之為去殖民、抵中心的手段。本文則回歸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脈絡，重新挪用盧卡奇的理論洞見，不只重新詮釋王禎和《玫瑰》一書的情節內容，也釐清其美學與形式特徵。寫實主義是分析現實的最佳工具，而理想中的寫實主義小說並不止於表面現象的描述，而是運用典型人物完整呈現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階段下的社會關係，並深入描繪資本主義的精神與運作邏輯。此種寫實小說因此呈現社會

84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279。
85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1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體性，並隱含了有如社會主義式的剖析與批判。就內容而言，王禎和的小說描繪了臺灣資本主義由傳統產業走向企業化的階段中的典型人物，包括資本家、知識分子、政客與底層勞工，以及他們所構成的社會關係。小說一方面透過動態的敘事，呈現動態的社會關係，並暗示社會總體性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無限擴張的特質，但另一方面透過倒敘的形式，賦予小說一個結尾感，儘管故事尚未結束。此外，《玫瑰》在形式上，同時是一部充滿插科打諢、嘲諷、荒謬情節的喜劇。在王禎和／董斯文的帶領下，讀者會如王德威所說：「暫時擱置其正義感或道德觀，姑且以寬容輕鬆的心情進入他的世界裡，一塊兒攪和一番」[86]，一同享受創作與創業的樂趣。另一方面，敘事者作為個體化後的評論者，又為讀者拉開批判反思的距離，因此王禎和的社會主義寫實喜劇像是一面哈哈鏡：當我們看見其中扭曲的醜惡面貌而哈哈大笑時，卻忽然驚覺我們所嘲笑的對象竟然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6 王德威，《眾聲喧嘩：三〇年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頁 242。

引用書目

丁庭宇、馬康莊編，《臺灣社會變遷的經驗》，臺北：巨流出版社，1986。

〔英〕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新帝國主義》，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

王禎和，《香格里拉》，臺北，洪範書店，1980。

———，《人生歌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7。

———，《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

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臺北：時報出版社，1986。

———，《眾聲喧嘩：三〇年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

文堯，〈紅茶與冰淇淋——王禎和訪談錄〉，《大同雜誌》73年6月號，頁10-17，1984年6月。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1983。

〔英〕艾恩・瓦特（Ian Watt）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美〕艾瑞克・西洛瑟（Eric Schlosser）著，陳琇玲譯，《速食共和國——速食的黑暗面》，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2。

〔英〕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縣：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朱偉誠，〈國族寓言霸權下的同志國：當代臺灣文學中的同性戀與國家〉，《中外文學》第36卷第1期，頁67-107，2007年3月。

李文卿，〈走過殖民：論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之戲謔書寫〉，《文學臺灣》第63期，頁184-204，2007年7月。

李育霖，〈翻譯與地方文學生產：以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中外文學》第35卷第4期，頁17-36，2006年9月。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臺北：遠景出版社，1997。

〔美〕李維特（Steven D. Levitt）、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著，李明譯，《蘋果橘子經濟學》，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谷浦孝雄等著，雷慧英譯，《臺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臺北：人間出版社，2003。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4。

林鐘雄，《臺灣經濟發展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美〕約翰‧梅森（John W. Mason）著，何宏儒譯，《冷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紀大偉，《正面與背影：臺灣同志文學簡史》，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

〔德〕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唐山出版社，1991。

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臺北：三民書局，1997。

陳映真，《西川滿與臺灣文學》，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

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78。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臺北：唐山出版社，2003。

劉至瑜，〈臺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臺灣人文》第4期，頁1-20，2000年6月。

龍應台，《龍應台評小說》，臺北：爾雅出版社，1985。

Bernstein, J. M.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acs,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rint.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rint.

Booth, Wayne.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rint.

Brewer, Anthony.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rint

Carter, Simon. “Sex in the Tourist Cit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ex as Part of the Provision of Tourist Services.” *Tourism and Sex: Culture, Commerce and Coercion*. Ed. Stephen Cliff and Simon Carter. London: Pinter, 2000. Print.

Jameson, Frederic.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ri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1986): 65-88. Print

Lukacs, Geor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rint.

——. *Writer &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1. Print.

——. “Marxist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Realism.”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Ed. Michael J. Hoffman and Patrick D. Murphy. 2nd e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4-146. Print.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Ed. David Frisby. Trans.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rint.

Sturdevant, Saundra Pollock, and Brenda Stoltzfus.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Prostitu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in As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3. Print.

Warren, Bill.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0. Print.

Wood, Ellen Meiksins.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3. Print.

Young, Robert.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Pri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ocusing the Lens on Taiwan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ism: Rereading Wang Zhenhe's Novel *Rose, Rose, I Love You*

Shie, Elliott Shr-tzung*

Abstract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postcolonialism, Qiu Gui-fen has interpreted the male and female prostitutes in Wang Zhenhe's *Rose, Rose, I Love You* as the symbol of colonial Taiwan under American economic imperialism. This article, however, suggests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ism as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argu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x industry in *Rose* should be read as a metaphor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igenous corporation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aiwan, this novel examine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ex industry, a capitalistic economy based on calculation, the conspiracy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politicians, and the oppression of sex workers. Through the rhetoric of comedic exaggeration, this novel defamiliarizes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where everyone is involved, thereby leading its readers to realize that these laughable, comic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indeed the readers themselves. My reading of this novel seeks to challenge the framework of postcolonialism by suggesting that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colonizer and colonized often obscures the differences of subject positions on each side and reduc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in which nationality, gender, sexuality and class intertwine with one another.

Keywords: Wang Zhenhe, postcolonialism, sex tourism, prostitutes,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